

变译理论视角下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最佳英译模式探析

王丹丹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青岛

【摘要】文学作品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变得愈发重要。本文基于变译理论，以莫言笔下《红高粱家族》、《蛙》以及《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为研究语料，深入剖析这几部文学经典之作能够成功跻身世界文学殿堂的原因，并以此为镜，探寻中国文学作品真正走向世界、赢得国际认可的有效英译策略。

【关键词】变译理论；译者主体性；中国文学作品英译；传播路径

【收稿日期】2024 年 12 月 12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 月 20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45

Analysis of the optimal English translation model for the “going-out”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Dandan Wa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Abstract】 Literary works, as carriers of human culture, possess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unique aesthetic value, helping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values and lifestyles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variation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Mo Yan’s “Red Sorghum,” “Frog,” and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by Howard Goldblatt as research materials, deeply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these literary classics have successfully entered the hall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uses them as a mirror to explore effective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o truly go global and wi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Dissemination path

1 前言

一部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是成为世界文学的必要前提，本土的民族文学若想成为世界文学，翻译至关重要^[1]。因此，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无可避免地成为扩大对外交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展现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在西方的出版数量寥若晨星，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或归类为小众作品^[2]，因此如何译介出高质量、能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的文学作品成为当前翻译领域的一大焦点。

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活动始终以“译入”为主，因此在翻译领域中逐渐形成了“原文至上”、“忠实是唯一标准”等固化的金规玉律。时移世易，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与文化自信的增强，我们正从“翻译世界”

转向“翻译中国”，由“译入”迈向“译出”，面对当前西方市场对中国文学作品需求相对有限、接受度尚待提升的现状，译者应当因时而变，随时而制，将目的语读者需求和兴趣作为翻译策略选用的考量因素，只有让中国文学作品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障碍，走进国际文学舞台，才能逐步积累影响力，实现中国文学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2 变译理论

黄忠廉教授于 20 世纪末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变译理论，有别于以全译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译论。全译往往将翻译视为一种完全再现原文的过程，将忠实再现原作看做翻译的最高标准，旨在保留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力争使译文与原文能达到最大限度的相似；而变译理论

则以“变通”为理论核心,其本质在于“因读者而变,由译者来变,对原作施变”^[3],即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以读者为导向,带有目的地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七种变译手段^[4]译出符合读者需求的译文,达到交际的目的。

Lefevere(1995)^[5]认为译者不仅能赋予原作生命,还能决定赋予作品何种生命,以及如何将其融入到译文语境中。变译理论允许译者可以在不违背原作意义的基础上,通过大到文体、小到字词的修改满足读者需求,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去评价译文得失,而是站在文学和意义的高度看待译者的贡献。钱钟书曾指出,翻译必有一失,做到失与此、得于彼的关键就在于译者合理发挥主观能动性^[6]。虽然变译理论突出强调译者主体性,但译者受动性是译者主体性的前提,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受到客观对象、客观环境和客观规律的限制^[7],不能随意发挥主体意识进行滥译、误译。因此,变译理论要求译者在译介过程中付出更多精力深刻剖析原作,发挥译文重构能力,选出最佳变译手段,实现最佳翻译效果。

3 变译理论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应用

中国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散文小说,无不彰显出中华民族卓越的文学创造力与深厚底蕴。在这片文学的沃土上,莫言以其独特的笔触,用文字将中国乡村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与超现实元素巧妙融合,创造出一个个既根植于现实又超脱于现实的奇幻故事,这些作品如同一扇扇窗,让世界得以窥见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他笔下魔幻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与葛浩文译者主体性下的变通翻译共同谱写了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辉煌篇章,本文将以前述译者主体性为前提,分析增、减、缩等七种变译手段在葛译本中的应用,探究推动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的英译策略。

3.1 减和缩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注入世界文学的一部文学巨作,在葛浩文英译本中,“减”和“缩”这两种变译手段最为明显。这两种翻译策略都是通过删减文中内容或对原文内容进行压缩而使原作篇幅减少的一种手段,通常用于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以及对故事情节无推动作用等方面内容的翻译。

例1:“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原是一以贯之。……正像毛泽东主席说的:温度可以使鸡蛋变成鸡子,但不能使石头变成鸡子。孔夫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我想都是一个道理。……,只有她才敢把梅花栽到鹿背上^[8]。”

译文: Only Grandma would have had the audacity to place a plum tree on the back of a deer.^[9]

原文引用了多位名人名言,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奶奶”这一普通人的角色相互碰撞,产生幽默诙谐的效果,令读者语尽而回味无穷,但在英文翻译中,这些复杂的引用和堆砌可能会让英文读者感到困惑和烦躁,因此,葛浩文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巧妙地运用了“减”的变译手段,既保留了原文的核心意思,又避免了文化障碍。

例2:……心中虽有千般滋味却说不出个酸甜苦辣,肚里纵有万种狐疑也弄不出个子丑寅卯^[8]。

译文: ...and even though they had a bellyful of misgivings, in time, one after another,....^[9]

原文中“酸甜苦辣”和“子丑寅卯”具有象征意义,“酸甜苦辣”在文中并非指四种味道,而是象征着内心复杂多变的情感和体验。“子丑寅卯”也并非指四个时辰,而是象征着难以理清的各种疑问或思绪。逐字逐句地翻译会令读者不知所云,难以将前后文内容联系起来,因此译者采用了“缩”的变译策略,更加注重原文意义的传达。

3.2 增、编和并

《蛙》于2012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解开了我们长久以来的诺奖情节,这部匠心之作生动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来农村生育史的波澜壮阔与社会变迁的沧桑巨变,文中包含大量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信息,在葛浩文英译本中,七种变译手段贯穿始终,这里通过举例对“增”、“编”和“并”三种变译策略进行分析。

(1) 增

“增”是指在译文中增加原文中未直接表述但有助于译语读者理解的信息,有助于填补因文化差异、语言习惯或表达方式不同而产生的信息空白,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意义更加完整清晰。

例3:从古到今,衙门口,朝南开^[10]。

译文: Since olden days, the yamen, the official residence, has always faced south.^[11]

在古代中国,“衙门”通常指官府或官员的办公场所,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若直接音译为“yamen”,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背景的译语读者来说,可能难以直接理解其含义。译者考虑到读者需要,在保留原文文化特色的同时,通过增译“the official residence”来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和理解度。

(2) 编

“编”是指译者在深入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其进

行创造性重组,使译文更加凝练且条理清晰。

例 4: 二百斤重的石碌碡,双手抓起,胳膊一挺,便举过头顶^[10]。

译文: He could lift a stoneroller weighing two hundred jin over his head.^[11]

汉语倾向于意合,注重内在逻辑与意境的传达;而英语则强调形合,通过严谨的结构和语法来确保意义的准确性。因此译者以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为导向,灵活运用“编”的变译手段,打破了原文的散句形式,通过运用动名词和介词将信息重新排列,使译文更加紧凑有力,符合英语读者的线性逻辑。

(3) 并

“并”是指将原文中性质相同或具有明确逻辑顺序的内容合并翻译,让译文结构更加紧凑有序。

例 5: 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干什么吆喝什么。三句话不离本行^[10]。

译文: People do what they're best at and peddle the goods they have.^[11]

“敲锣卖糖,各干一行”是一句俗语,在这里并非强调卖糖这种职业,而是指人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或行业中活动,因此译者并没有采用直译的方式,而是合并译为“People do what they're best at”,后两句都表示人们会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的职业特征,译者也采用了“并”的翻译策略,合并译为“peddle the goods they have”。

3.3 述和改

《生死疲劳》是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国门的成功之作,以动物的视角带领读者感受了五十多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纷繁喧嚣及其历经苦难的转型历程,其中包含许多文化内涵较为丰富的内容,译者在翻译时采用了大量“述”和“改”的变译手段。

(1) 述

“述”这种变译手段不拘泥于原文的字句对应,侧重于将原作的核心内容或关键信息以译者的语言重新表述出来。

例 6: 破罐子破摔^[12]。

译文: Act reckless if you think your own situation is hopeless.^[13]

“破罐子破摔”是中国的一句俗语,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或组织在面临失败或困境时,不是积极寻求解决之道,而是采取一种放任自流、不再努力改善的态度,如果直译为“A broken jar is smashed.”并不能完全传达出作者意在表达的含义。译者考虑到读者的需求,采用

了“述”的变译手段,用自己的语言将原文的内涵译出,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

(2) 改

“改”,即改变,可能会改变原作的部分内容、形式或风格,(黄忠廉,2002)使其更加符合现代读者的审美需求或传达更为鲜明的主题。

例 4: “要是我的驴有个三长两短,咱们的事就没完没了。”^[12]

译文: “If anything fortunate happens to my donkey because of this, you'll pay, and pay dearly.”^[13]

“三长两短”通常指受到伤害或死亡,直接翻译为字面意思无法传达其真正的含义,译者改用“anything fortunate”一语言之,“咱们的事就没完没了”指双方之间的纠葛或问题会持续不断,译者没有局限于字对字翻译,而是通过更换主语,由“双方纠缠”改为“对方将会承担麻烦”的方式,来进一步强调后果的严重性,使译文更加生动有力。

4 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因变生花

变译理论源于实践,成于思辨,且根植于本国的学术土壤^[4],与当前中国致力于从“译入翻译”迈向“译出翻译”所需的翻译理念相符,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有部分译者认为变译理论对全译的异化以及对“忠实”标准的“叛逆”会让原作的的神韵荡然无存,无法重现中国文学和文化原貌的作品走向世界并不符合我们对文化走出去的期待。谢天振表示,特定历史阶段的翻译对象是形成该历史阶段译学观念的重要制约因素^[5],譬如,在《圣经》翻译阶段,多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以忠实原文作为不可违背的翻译准则;在翻译实用文献阶段,更加注重翻译功效,忠实则不再是唯一考量因素。同时,“译入”与“译出”采用的翻译标准也不尽相同,过去为将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引入中国,我国的翻译活动主要以译入为主,忠实原文被奉为圭臬,但只有当译入语环境内部对异域文学与文化具有迫切需求时,这种翻译理念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6]。

在当前西方对中国文学需求较低背景下,如果将全译作为主攻方向,用过去译入翻译采用的翻译方法及标准指导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译出实践^[5],也许能更多保留中华文化独特的韵味和魅力,但只关注语言层面对等,不顾译入国的意识形态以及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倾向,将“忠实”作为各个翻译阶段以及各类文本普适的翻译标准,很难实现中国文学作品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正如谢天振所言,如果译者对接受地市场的读者口味和审美习惯不甚了解,只是

一味地抠字眼,讲求翻译准确,即便投入再大的努力与辛劳,也难以引起市场的关注与共鸣^[17]。因此,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不能操之过急,贪多、贪大、贪全,改写也许比全译的译本接受效果要好^[18]。

5 结语

变译理论强调对原作施变是另一种深度忠实,不在语言层面,而在意义层面,为译者提供了有效的翻译手段和全新的翻译思路。忠实完整的译本无人问津,注定走不进世界文学的海洋,比起亦步亦趋地按照原作直译、全译,运用变译理论,以读者为归依,发挥译者主体性对文学作品适当施变,使之在更大程度上契合读者的期待视野,才能让读者接受并喜爱充满异域情调和东方色彩的中国文学作品,唯有读者接受,中国文学才能在世界文学的浩荡洪流中屹立不倒,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参考文献

- [1] 王汝蕙. 莫言《生死疲劳》英译本在美国的译介效果研究[J]. 文艺争鸣, 2023, (06): 178-183.
- [2] 赋格, 张健. 葛浩文: 首席且唯一的“接生婆”[A]. 来自中国文学网. 2009年9月2日.
- [3] 黄忠廉. 变译研究体系[Z]. 青岛: 全国译学学科建设会议. 2001.
- [4] 黄忠廉. 变译的七种手段[J]. 外语学刊. 2002, (1): 93-96.
- [5] Lefevere, A.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95, (1): 1-10.
- [6] 丁闯. 变译理论在旅游资料翻译中的应用[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4(01): 179-181.
- [7] 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 2003, (01): 21-26.
- [8] 莫言, 《红高粱家族》[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 [9] Goldblatt, H. *Red Sorghum*[Z].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93.
- [10] 莫言. 蛙[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 [11] Goldblatt, H. *Frog*[M].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4.
- [12] 莫言. 生死疲劳[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
- [13] Goldblatt, H.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M].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12.
- [14] 黄忠廉, 袁湘生. 变译理论专栏[J]. 上海翻译, 2018, (04): 71.
- [15] 谢天振. 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J]. 中国翻译, 2012, 33(01): 13-15.
- [16] 柴明颀, 胡开宝, 李瑞林, 等.“何为翻译?——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高层论坛发言选载[J]. 东方翻译, 2015, (03): 4.
- [17] 谢天振. 从译介学视角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 2013-11-04.
- [18] 王志勤, 谢天振. 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 问题与反思[J]. 学术月刊, 2013, 45(02): 21-27.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